

文化交流是不可避免的¹

周清海

摘要

“文化内向”不只唯我独尊，而且养成了“中原”心态。表现在政治上，便是“接受朝贡”的心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结束了“礼乐化外邦”的想法。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文化，而去研究外来文化的影响，就可能出现对外来文化毫无根据的夸大与赞扬。今后研究文化、文化交流，在自信的基础上，占有资料，就能客观地发现许多过去所没有考虑过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内向 文化对话 文化冲击 《资治通鉴》

¹ 根据 2001 年 11 月 4 日《联合早报·论坛》上的论文修改。

周清海，香港教育大学、华侨大学，联络电邮：chewchenghai@gmail.com。

文化是人类的财富。人类的交往，就提供了机会，让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与交流。在不同文化的接触中，人们根据自己所处的文化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心理，以及自己和社会的各种需要，决定如何去对待外来文化。人类有交往，文化交流就不可避免。

我们结合历史的发展来观察文化交流。将文化交流问题分为三方面来谈论：一、对待外来文化的三种态度；二、包容而客观地研究文化交流也需要有立场；三、具有民族信心，才能更客观，更有信心地思考外来文化。

一、对待外来文化的三种态度

面对外来文化，可以采取不同的三种态度。

一、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高尚的，别人的文化是低下的，因此鄙视外来文化，讥笑外来文化。这种强调自己文化的优越性，鄙视外来文化的例子，最早的例子见于《论语》：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两腿像八字一样张开坐在地上，等着孔子。孔子骂道：“你幼小的时候不懂礼节，长大了毫无贡献，老了还白吃粮食，真是个害人精。”说完，用拐杖敲了敲他的小腿。）（杨伯峻，1965）

原壤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不只臭骂了老朋友，并且气得“以杖叩其胫”，这跟原壤的“夷俟”有密切的关系。

当时，中原人的坐式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这在甲骨文里看得很清楚。夷，甲骨文就是“蹲”的形象。中原人的坐式是“跽”，夷人的坐式却是“蹲”（我不同意杨伯峻“两腿像八字一样张开坐在地上”的说法）。甲骨文里与日常起居有关的字，如“即、既、吹”等字，坐式都是“跽”。原壤以夷人的坐式——“蹲”着等孔子，这对于主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而中国则

中国之。”《韩愈·原道》的孔老夫子，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难怪对老朋友以夷人的坐式（蹲着）等他，他气得又骂又打。夷夏之别，在孔子那个时代是俨然的。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都是这种歧视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轻视外来文化，他把“为神农之言”的许行比作“南蛮馼舌之人”，认为许行所说的是“非先王之道”，又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孟子·滕文公上》。对于异己，除了见解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见解是来自不同的族类，所以持断然否定的态度。

韩愈也轻视外来文化，对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说“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甚至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但是，中国后来还是接受了佛教文化，虽然佛的造型具有外国人的色彩，但对这些造型，中华民族并不以为“外”。中国既接受了佛教，但同时也改造了佛教。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致西方学者有“佛教征服了中国”（许理和，2003）之说。

若持着华夏文化的优越感，而鄙视外来文化，华夷之辩，就是文野之别。这种心态的进一步发展，就对他族文化缺乏兴趣，认为外来文化完全没有值得了解和借鉴的地方，这便形成了“文化内向”。

“文化内向”不只唯我独尊，而且养成了“中原”心态，表现在政治上，便是“接受朝贡”的心理。明代郑和下西洋，虽然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奥斯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了93年，比麦哲伦到菲律宾早了110年，但西方殖民地遍布世界，而中国却从未占领任何地方，这恐怕也跟中国文化上的独尊心态，以及“接受朝贡”的心理有关。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势力的压迫下，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发生了动摇。这个冲击结束了以前“礼乐化外邦”²的想法，以夷夏代表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的时代，就此正式宣告

2 宋史：“中国者，礼乐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动止猷为，必适于正。若乃听诬受间，肆诈穷兵，侵人之土疆，残人之黎庶，是乖中国之体，为外邦之羞。”

结束了。

在西方势力的压迫下，自己的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更严重的是受到别人的轻视，可能出现三种态度：

第一种态度，是更热爱自己的文化。最早的例子见于战国时代的楚国。楚国文化，和中原文化不同，因此被认为是“异声”，受到轻视。但是，屈原却以楚声入诗，以楚民俗入诗，创造了“楚辞”。屈原是他那个时代非常突出的代表。秦统一天下之后，流传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史记·项羽本纪》，以及项羽战败之后，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都可以看成是这种精神的延续。

民国期间强调的“国粹”，多少也具有这种成分。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更是和面对外来文化的压力有关。国家、民族处于衰败时期，以自己的文化认同为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民族，团结自己的民族，并将外来文化和国家存亡联系起来，这就导致封闭排外。

或者认为外来文化的任何优点，都是自己的文化里早已具备的，梁启超（2009）所说的：“清季承学之士，喜言西学为中国所固有，其言多牵强附会，徒长笼统嚣张之习，识者病焉，……顽固老辈之蔑视外国，与轻薄少年之蔑视本国，其谬误正相等。质而言之，弊在不学而已。”这些观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出现的产物。

在多元种族的国家里，如果政权与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的分配不均匀，便出现了民族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的对立，也会对文化的认同产生影响。马来西亚华人属于非特权族群，因此而强调“**more Malaysia no less Chinese**”，出现了华族文化复兴的局面。这也是在面对外来政治和文化压力下，出现更爱护自己文化的例子。

在华族文化复兴的局面下，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同时也面对中国发展的大局面，应如何进行调整，便成为关心华文教育者争论的焦点。英语和华语的教学，如何平衡发展，是应该不带情绪地加以讨论的。

第二种态度，是崇拜外来文化，认为自己一切都不如人。不少人

尽管不同意或者嘲笑“假洋鬼子”，但内心却难免多少认为自己不如人。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大段日子里，中国被迫接受西方文化之后，中华民族多少都存在这种心理。

世界上，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也普遍存在这种心理。这充分表现在各种社会行为、学术行为、文化行为和语言行为上。在中英双语社会里，例如新马、港台，甚至中国大陆、美欧澳纽等地，研究语码转换或语码混用的社会语言学者，都发现华人用中文时，杂用英语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说英语时杂用中文的，却非常少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华语词语，或可能是这个外来词还没有适当的中文译词之外，也和把“说英语”当作是受过高等教育、代表高社会阶梯的心理有关。

在这种心理的压力下，虽然主张各个领域应该全盘西化，但对于传统的价值根源却也不愿意完全放弃，因此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与文化自卑感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成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但“抛弃黄土文化，接受蓝色文化”的崇洋现象，却是这个特征里的主导，最主要的倾向。这个倾向，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上。

第三种态度，是以自己的文化为本，客观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里有益于自己的成分。认为“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就不可能充分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充分地吸收外来文化不仅不会使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中断，反而会大大促进自身文化传统更快更健康地发展”，“当今文化的发展，必定是‘全球意识’和‘民族意识’的结合。”

当民族国家处于兴盛时期，不仅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认同感也强烈，并且也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从外来文化中吸取有益于自己发展的东西。这种态度，只有在自己民族自信心建立起来以后，才可能出现。这个时期对待外来文化通常比较开放、宽容。

我为童庆炳、谢世涯、郭淑云等人的《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写序时说：“童先生等人将中国古代文论放在现代学术视野中

来进行研究，试图从而改变那种西方现代文论‘霸占’中国文论的局面。这个抱负是崇高的。他们就这些世界文论的共同话题，进行中西“互为主体”的平等对话。我特别欣赏‘互为主体平等的对话’这个主张。要做到这样，除了必须能贯通古今，融合中外之外。更重要的是从事者必须充满信心，自己深刻了解传统，相信祖先的智慧。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建立自信，肯定传统，充分表现在这本书里。”（童庆炳、谢世涯、郭淑云，2002）文化研究的“互为主体平等的对话”，是今后中国学术研究的应走的正确路向。

二、包容而客观地研究文化交流也需要有立场

21 世纪，中华民族重新建立自己的信心。有人认为 19 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而 21 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民族自信心的重建，使中华民族有可能重新审视外来文化，更客观地对待、研究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里，有许多可贵的文化，值得我们珍惜，比如文献里记载了、表达了不少对人的行为的看法，对人才的分析以及怎样选用人才，这些都不是西方才注重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周纪一》里就有一段非常精彩、深入的论述：

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犬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遗於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於颠覆者多矣……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於才

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这些精辟的论述，在现代讨论用人和人事管理的论文里，却不见引用，仿佛人事管理完全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文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于用人和做事，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在对待外来文化，研究文化交流时，如果对自己的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缺乏对自己文化的肯定，不只不能保持自己文化的生命力，不能充分吸收各种适应时代要求的外来文化，也不能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且更加可悲的是将失去民族的自尊心。

我们必须站在自己文化历史的立场去观察外来文化，去研究外来文化的影响，才不会出现对外来文化毫无根据的夸大与赞扬。

就以现在的教育学科为例。这些学科介绍了太多的外来教育理论，而忽视自己的教育传统，就是不好的倾向。语文教学里，重视阅读与写作，也是中国的传统。如果现在的教育课程里，没有介绍自己的传统，而只谈论西方的阅读理论，就不能不是缺失。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师资培训课程，就有这个倾向。因为在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双语教育下培养的新加坡、香港的师资培训人员，不熟悉华文资料，也没有充分的信心利用华文的资料。

香港的割让，虽然使它有机会发展成为华语区的出版中心，也发展了影视业，在国共对抗期间，为华语区提供了精神粮食。香港也是现代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起到了不少的作用。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肯定香港的割让是合情合理的。叙述香港的历史时，被占领被统治的经历，仍然应该是主要的，而对香港在现代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偶然作用，也应该有开阔的胸怀加以承认。如果只看到香港现阶段的繁荣，而遗忘了被英国占领、被英国统治的历史，就是不平衡、没有立场的看法。

这种不平衡、没有立场的观点，使一些香港人不能适应香港现阶段的变化。要做到客观，不但必须对自己有信心，而且也要有包容的

胸襟。包容和客观，是我们应该培养的研究文化与文化交流的态度。

有立场，又能包容而客观地研究文化交流，是应该被充分重视的。我们在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进成就时，更应该发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这样才能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才能增进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才能使世界文化更丰富多彩。

只有肯定自己、有立场，才能客观、包容地讨论文化和文化交流问题。再以现代中国的语言研究为例。中国的语言研究无疑是受到西方语言科学的不少影响，但对自己传统的语言研究，也必须有深刻的认识，这样在介绍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时，才能做到有根据，有立场。中国现代的语言研究者，有些人对传统的小学，不甚了解，甚至有意忽视，不能说不是个遗憾。

从历史上看，一种外来文化在它开始传入另一个国家时，必然会遇到如何对待原有文化传统的问题。如果要想使外来文化在所传入的国家里能比较容易流传和发生影响，就必须与原有文化有所认同，这是文化移植中的重要问题。

利玛窦来华后，先后在澳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他对中国传统的习俗保持宽容的态度，容许中国教徒继续传统的祭天、祭祖敬孔，认为只要不掺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质上并没有违反天主教教义。他还主张以“天主”称呼天主教的“神”，并指“上帝”概念早已存在中国上古文献中，中国传统的“天”和“上帝”本质上与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没有分别。利玛窦本人更穿著中国士人服饰。

西方传教士在明末来到中国，儒家的夷夏传统仍然蒙蔽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传教士对于西方文化教育的介绍，使得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夷夏传统中摆脱出来。这些来华的传教士传播的主要是基督教文化，也附带传播了一些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知识，而后一种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以自己的文化为本，有信心地、客观包容地审视外来文化，接受外来文化有益于自己的成分。这种态度，在自己的民族信心建立以

后，将成为今后讨论文化与文化交流的主流态度。这也和今天所强调的文化多元化的主张相一致。

多年前，在新加坡举行的华文应用文国际讨论会上，我主张“华文应用文要在格式、用语、分类等方面达成国际化标准。规范化当然需要时间，各华语区的步伐也不必一致，但是整体框架可以提出来，逐步实现。建立这个框架，我们应该适当地参考英文应用文，毕竟它的国际化比华文早。”这个主张就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提出来的。

如果不能汲取外来的、有益的文化以充实自己，并不断地扬弃本民族文化中不利于自己发展的东西，将阻碍自己的发展。只有以自己的文化为基础，不断地融合汲取外来文化中先进的因素，才有助于自己文化的发展。

三、具有民族信心，才能更客观，更有信心地思考外来理论

与外来文化接触，让我们能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处境里解脱出来。以语言研究来说，汉语音韵学的建立，和佛教的东传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与西方语言接触，我们才发现自己语言的特点。黄遵宪与外来文化接触，就发现了“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者多；其势然也。”胡适因此赞誉他为白话文始祖³。要做到“语言与文字合”，就必须在语文方面做些改革。白话文运动和以后汉语拼音化问题的讨论，以及现在用的汉语拼音系统等等，也都是中文和外语进行了语言接触以后才出现的产物。

马建忠要揭示经籍中的规矩，编写了《马氏文通》，以便让“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其成就之速必无逊於西人”。这是他在比较了“华文之点画结构”与“西学之切音”以后，才提出的主张。马建忠因此成为了第一个重视和肯定语法对语文教学有作用的学者，成为了提倡“教学语法”的第一人。尽管《马氏文通》说的是文言文，但

³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而作，记载当时五十年新旧文学过渡时期的历史，完稿于1922年3月，次年发表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

我们在讨论教学语法系统时，还是应该从《马氏文通》开始。现在研究教学语法的学者，忽略马建忠在中国教学语法上的贡献，是不对的。

中国有些研究《马氏文通》的学者，虽然肯定他的贡献，但也在批评他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以今律古”等等。关于这些批评，我认为：

我们不应该根据现在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强求於《马氏文通》，更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政治风向，将对古人的研究，或者把过去的学术研究当作取悦於当代的工具。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学术，才对得起古人，而民族的自尊才得以建立。（周清海，1999；周清海，2004）

研究文化或文化交流，应该避免再重蹈“为了一时的政治风向，将对古人的研究，或者把过去的学术研究当作取悦於当代的工具”的覆辙。

我们需要将学术研究与政治需要脱钩，让文化与文化交流的研究在更自由的空间里进行。

此外，研究文化交流，也必须有历史观念。就以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为例，这也与中外文化的接触有密切的关系。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中国早就和西方有所接触，将西方的科技、天文、医药方面的书籍译成汉文。这些翻译的文献与词汇，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曾经发生巨大的作用。马西尼（1997）说：“这些有关西方的最重要著作，约于19世纪中叶在中国出版，后于1868年前后在日本重版。它们构成了有关西方国家的信息宝库，这些书可能还向日语传去了在中国用来翻译西方概念的那些新词。”后来，许多词汇更通过中国的留日学生、学者重新回流中国。但在研究现代汉语词汇方面，我们却将好些回归的词汇，都划入从日本来的外来词汇。这是因为研究者缺乏历史观念，也没有好好整理文献资料的缘故。

在讲述日本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之前，先分析一下汉语对日语的影

响是很有用的。汉语对日语的影响早在明治维新（1868年）前几十年就开始了。19世纪末，有些词汇又回流中国，因为当时中国以日本为榜样。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一些学者，通常集中强调后面的这个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以为是借自日语的。而事实上是，这类词汇中有的的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又回流到中国。

就因为“当时中国以日本为榜样”，主观地认为自己在那个时代不如人，所以就不可能客观地认识历史事实。从现代汉语词汇形成的研究这个例子，就彻底地说明了历史观念和占有资料的重要性。

主观地认为外来的理论是无缺的，不深思地直接套用在自己的研究上，也会造成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这种祸害也是很大的。比如对汉语复音化的研究，都认为复音化是因为语音简化了，为了避免同音词过多和受外来语影响的结果。王力尽管知道“从先秦的史料看来，汉语已经不是纯粹的单音节语”，但他还是说：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词汇必然越丰富，越纷繁，即使语音不简化，也不吸收外来语，汉语词汇也会逐渐走上复音化的道路，因为这是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之一。不过，由于有了这个重要因素，汉语复音化的发展速度更快了。（王力，2001，页516—528）

但唐钰明（2002）却认为“总之，汉语复音化由最早的突破开始直到今天的日趋多音化，只有语义的精密化是它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因，而避免同音词也好，外来语的吸收也好，都不过是次要的因素罢了。”唐钰明是在充分掌握了甲骨文、金文的词汇资料，在不迷信外来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这是必须充分加以肯定的。

民族信心的建立，让自己能更客观，更有信心地去选择、思考外来理论，在借用外来理论时，不至于盲从。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古代学者对教育有许多可贵的看法，都应该研究和整理。目前教育界大量地借入西方的教育理论，而不重视

古代学者对教育的看法，也是应该检讨的。

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无论从事哪方面的研究都非常重要。我曾经对研究文学的朋友说，如果有一天，有人用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去审视外国文学，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局面？

今后研究文化、文化交流，在自信的基础上，占有资料，就能客观地发现许多过去所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我盼望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大前提下，在有利的大环境下，能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 梁启超 (2009):《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马西尼 (1997):《现代汉语词汇地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唐钰明 (2002):金文复音词简论,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童庆炳、谢世涯、郭淑云 (2002):《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北京出版社。
- 王力 (2001):《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 [荷]许理和 (2003):《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杨伯峻 (1965):《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 周清海 (1999):关于〈马氏文通〉的评价问题,《第二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系编。
- 周清海 (2004):《语言与语言教学论文集》,新加坡,泛太平洋出版社。

Cultural Exchange is Unavoidable

— A Deliberation on Chinese-Western Cross-cultural Studies

CHEW, Cheng Hai

Abstract

Historically, an “inward-looking culture” had not only bred the “Middle Kingdom” mentality in China, but had also given rise to the concept of China’s entitlement of “receiving tributes.” It was only after the Opinion War that the Chinese sense of cultural superiority and the belief of China’s mission to “civilize foreigners with rites and music (i.e. Chinese culture)” were shaken unprecedentedly. While an “inward-looking culture” is not healthy,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one’s own culture is also harmful. The lack of appreciation of one’s own culture will result in the tendency to exagger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foreign cultures when studying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s on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ny meaningful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well as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must base on self-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ufficient resources. Only then may one be able to study the issues objectively and come up with new perspectives.

Keywords: inward-looking culture,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cultural challenges,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Zizhi Tongjian)